千面之后,须见本色

赵哲群

近年来的越剧舞台佳作频出,新意迭现。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新龙门客栈》《我的大观园》《苏东坡》,南京市越剧团的诗韵越剧“金陵三部曲”及《虎踞龙盘》,还有嵊州市越剧团的《女班》,都在不同方向上拓展着越剧的表现空间。经典被重新讲述,历史人物获得新的舞台想象,剧场形式也在不断变化。一出出新作各有取径,各具面目,“千面越剧”由此成为当下戏曲界的一抹盛景。与此同时,宏阔、唯美、诗化的舞台趣味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新创剧目。《苏东坡》的髯口群舞,《女班》的集体练功,《我的大观园》中的元妃省亲与十二钗群像,都以舞蹈化、意象化的调度形成颇具视觉冲击力的舞台场景。这些处理自有其艺术依据,而值得留意的,是某些有效的舞台方法正在不同作品中成为共享的创作语汇。导演构思、视觉表达乃至人物呈现由此显出某些相近的审美趣味,千般面目之下,“千戏一面”的隐忧也随之浮现。面目之多,终究不能直接换算成艺术创造的厚度。文艺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考验的已不只是新作能否不断出现,更在于一出戏能不能真正立得住。“高原”可以由千般面目铺开,“高峰”却只能由那些真正有本色的戏立起来。

越剧从嵊县的村坊小曲成长为风格独特的地方剧种,走的是一条不断固本开新的道路。进入都市以后,袁雪芬推动的新越剧改革,使越剧的更新逐渐深入声腔、表演和人物塑造之中。新的题材和人物首先向原有声腔提出了新的要求。1943年创作《香妃》时,为表现人物深沉悲切的情感,原有明快跳跃的四工腔已难尽其意,袁雪芬遂与琴师合作形成低回婉转、细腻深沉的尺调腔。1945年范瑞娟演出《梁祝哀史》,又在“山伯临终”等人物情境中形成弦下腔,使越剧表现悲剧人物的情感层次更加丰富。此后,新的声腔在一出出新戏中不断被使用和调整,又与演员各自的人物理解相结合,逐渐形成袁雪芬、尹桂芳、范瑞娟、徐玉兰等各具风貌的流派艺术。越剧在成长为成熟剧种的时期,新作频仍,新的声腔、人物和表演经验也由此不断生成。真正有生命力的“新”,最终都会从一时一戏中沉淀下来,固化为剧种本色的一部分,并在后来的创作中继续延展。越剧的本色也正是在这样的创造与沉淀中日益丰盈。

中国古代文论很早就强调艺术自有其体。严羽在《沧浪诗话》说“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至明代,“本色”逐渐成为曲论中的重要尺度。今日重谈本色,仍然关乎戏曲创作的根本判断。一出戏能否立起来,取决于它能否形成属于自身的艺术气质,并在人物、声腔与表演之间建立起独特的关系。《香妃·哭头》便是一个很有意味的例子。尺调腔最初生成于香妃这一人物特定的情感表达,随后又在《梁祝》《祥林嫂》等剧目中不断丰富,最终成为越剧的重要主腔。一出戏由此获得的艺术经验,经过反复实践进入剧种内部,也成为越剧本色的一部分。回到今天,越剧新作频出,舞台面貌日益丰富,这样的盛景下,我们更需要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新题材、新形式、新观念可以带来一时之新,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追问,这些新作能否形成自己的本色,又能否把其中有生命力的创作沉淀下来,继续丰厚越剧的剧种本色。本色决定一出戏能否真正自成一面,也决定一时的新意能否进入一个剧种更长久的生命。

一部作品如何形成自己的本色,又怎样把新的艺术经验留给剧种,越剧对《红楼梦》的反复书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1958年,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越剧《红楼梦》,让贾宝玉与林黛玉由此在越剧的声腔与表演中获得了鲜明的舞台形象。此后不同流派、不同演员不断进入这一文本,人物也在一次次表演中获得新的气质和尺度。今天的《我的大观园》和《织造府》再次面对《红楼梦》,前者以宝玉的生命回望重组大观园,后者让曹雪芹走进自己的书中世界,其鲜明之处首先来自新的叙事构造和文本解释。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经典在不同年代获得新的阐释,自然会带入一代人的精神经验。戏剧文本由此展开时代多元之思,戏曲的本色还要继续落实到舞台上。新的理解怎样进入唱腔,怎样改变人物塑造,又怎样在演员的身体与声音中形成新的表演尺度,决定着这些当代阐释最终能够留下多少。时代不断赋予经典新的意义,戏曲也要把这种意义重新化成能够承载剧种本色的艺术经验。对于当下越剧,这已经构成一道无法回避的创作命题。新戏真正要解决的,是如何让观念之新继续深入声腔与表演,并最终转化为剧种可以传承发展的艺术经验。

当下,京剧、越剧等诸多戏曲剧种已经显示出很强的自我更新能力。它们既敢于进入新的题材,亦敢于重释经典。透过当代越剧的“千面”之盛,思量戏曲艺术的发展,更值得关注的,是剧种在不断打开自身的过程中,如何始终保持清晰而稳定的艺术本色。新的舞台观念可以融入戏曲,新的剧场手段也可以不断被吸收,最终仍要回到声腔、流派、表演和人物塑造这些最能体现剧种品格的地方。百余年来积累起来的本色,正是一个剧种持续创新最深厚的依据,也决定着新的创造能否真正具有不可替代的意味。真正有价值的新变,应当使本色在时代变化中不断获得新的内容,也使一个剧种在千般面目中始终能够清楚地成为自己。“千面”之盛,最终还要见出本色之深。真正的高峰,耸立于本色深处,又在时代新意中显出新的峰峦。

(作者系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跨文化语境下中国民族乐器双语教材的编写理念

孔艳艳

全球跨文化交流不断拓展,中国民族乐器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是中外音乐文明互通互鉴的重要媒介。双语教材作为民族乐器海外教学与国际传播的核心载体,区别于常规单语器乐读物,兼具专业教学与文化对外传播双重职能:既要系统讲授演奏技法、乐理体系等专业内容,也要消解跨文化认知壁垒,阐释东方独特的音乐审美,构建中国传统音乐完整海外叙事。鉴于目前的一些民族乐器双语教材存在一定的短板,本文结合2024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英文专著《Principles of Erhu Playing and Teaching》(二胡基础教程)予以探析,以期进一步完善二胡演奏教学体系,夯实研究理论根基,推动二胡纳入国际音乐学术对话范畴。并试图依托该书理论框架,结合2025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二胡双声部音阶与琶音练习》训练范例,兼顾乐器专业属性与文化属性,系统优化适配性教材编撰路径,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

立足本土,融通域外,构建跨文化器乐认知范式

跨文化器乐教材编撰首要任务是重塑认知框架。传统教材默认编创者与学习者处于同一文化语境,对潜藏其中的文化预设不作阐释;但在跨文化传播场景下,这类固有认知易形成文化理解壁垒。构建跨文化器乐认知范式,核心是为二胡这类民族乐器搭建一套可转译、可对标、可对话的标准化知识阐释体系,具体可从三个维度系统推进。其一,厘清演奏技法背后的文化根源与声学原理。以二胡按弦力度为例,传统教学多依靠师徒口传心授,双语教材需要将其拆解为可视化、可量化的物理指标,明确指压、琴弦张力、有效弦长与音高变化的对应逻辑,同步阐释不同力度适配不同曲风的东方审美逻辑。其二,搭建中西音乐术语双向对照阐释体系。针对音色表述,传统二胡教学惯用苍劲、柔润、空灵等感性化形容,跨文化教材需要留存本土美学表述,辅以频谱、声音包络等声学客观维度,打造“文化审美表述+声学科学解析”双轨解读模式。其三,搭建文化对比学习支撑体系。各技法教学单元增设“跨文化连线”专属板块,引导学习者对比二胡运弓与西洋弦乐器弓法、二胡滑音与布鲁斯弯音的表现功能,在异同对照中搭建稳定认知支点。该范式既提供落地可操作的编写路径,更确立跨文化教材核心创作立场。

双语赋能,精准转译,搭建器乐知识传播桥梁

双语不是跨文化器乐教材单纯的文字转换载体,而是实现专业知识二次转化、重构传播逻辑的主要手段。精准转译的核心不是字词层面简单的对等替换,而是在中外音乐概念体系相匹配、专业学术话语统一适配的前提下实现的。二胡专业术语由单语教学语境转为双语体系后,各种核心专业词汇都要进行体系化的重建,这项工作既包含语言的转化也包含专业的学理。具体编撰过程中,精准双语转译可以从三个维度系统落地。一是创建一个分层分级的专业术语翻译体系。对于按弦、运弓、换把等实际操作基础术语,用国际上普遍使用的音乐专业词汇直接翻译。“音译释义、补充解读、乐曲实例”三者构成文化专属概念的表达方式,它包含韵、味儿、抑扬这些本土审美内涵的元素。以“韵味”为例,译名是Yunwei(rhythmic and tonal charm),配合对应的乐曲片段,直观地表现出其演奏技法和听觉美学特征。二是编制配套双语同步练习材料及教学指导。依据二胡双声部音阶与琶音练习的编写方式来创建练习的指令中英对应表,在此基础上加入简谱和五线谱两种不同的记谱法以及各个声部结构示意图以达到消除语言障碍、便于学生迅速了解演奏主要问题之目的。三是创建双语文化交流体系。在书页侧边、附录中设置文化关键词专栏,把每章节出现的专业术语、音乐典故、演奏流派都做成双语注解,建立贯穿全书的相互补充的完整的知识网络。

以乐载文,兼容并蓄,践行文化育人传播初心

教材建设的根本目的是立德树人。面向跨文化场景的民族乐器双语教材有双重任务,既要指导海外学习者打下坚实的演奏功底,又要依靠器乐教学向学生传达中华传统音乐的文化内涵。以乐载文,即音乐是民族思维和精神的听觉载体,不是音符的简单组合;兼容并蓄就是教材要守住本土文化的核心,又不能忽视学习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种文化的沟通渠道。该编写理念可以分成三步走来达到目的。其一,曲目编排遵循分层递进的文化逻辑。按照文化接受度排布乐曲内容,从基础音阶、民歌改编曲目,循序渐进地延伸到传统曲牌、流派经典,最后收录承载完整文化叙事的独奏曲。所有音乐作品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解析与欣赏方式,以《二泉映月》为例,梳理阿炳不同演奏版本的特点,探究“映月”意象背后寄情于景的传统东方美学内核。其二,教学提示设置文化对比思辨设问。讲解二胡吟揉技法时,设置开放性思考问题,引导学习者对照本土同类装饰演奏技法,辨析中外音乐表现手法的功能差异,充分调动自主探究意识,培育跨文化思辨能力。教材须兼顾技法传授与文明对话,引导海外学习者尊重、理解中华传统音乐,方能完整落实以乐育人、文化传播的根本宗旨。

目前,跨文化语境下民族乐器双语教材编撰已突破单一技法教学范畴,是涵盖认知体系重塑、专业知识转译、文化内涵传递的系统性工程。唯有扎根本土文化根基、拓宽域外对话视野,守正而不保守、包容而不失内核,才能依托教材提升民族器乐在国际交流中的学术地位与文化话语权,实现技能教学与文化阐释同步推进。

(作者系浙江音乐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二胡演奏与教学。本文系浙江省高等教育“十四五”教学改革项目“民乐国际化人才培养中的课程体系优化与教学方法创新实践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JGBA2024634)

数字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教育的路径创新

豆乃强 刘梦伟 裘丹娜

数字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知识传播格局发生变化,数字技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等教育传承创新开辟了新路径、新空间。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教育数字化”作出战略部署,指出“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这为数字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教育指明了方向。随着数字技术不断迭代发展,高校亟须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文化教育有机融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突破时空限制,进一步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广度与认知深度,培养更多兼具家国情怀和数字素养的时代新人。

构建数字化课程体系

推动数字技术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开发、教学设计、课堂实施、学习评价等过程,打造智慧教学样态,为学生带来沉浸式、交互式的学习体验,有效提升课程的吸引力和时代感。一方面,开发集成化数字课程资源平台。充分整合校内外图书馆、研究机构、文博机构等的优质数字文化资源,打造数字课程资源平台,推出经典文献数字资源库、历史文化虚拟仿真场景、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展馆等多个模块。同时,根据思想哲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不同维度对资源进行分类标注,方便教师按需调用组合。开发共建共享功能,鼓励师生积极上传文化调研成果和自主创作的数字文化作品,把平台打造成动态生长的学习共同体。比如,可以借鉴人民教育出版社等主办的“中小学传统文化教学资源云平台”的建设经验,开设国学经典研习、中医文化课堂、民族文化与艺术等栏目,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运用智慧教室重塑课堂教学流程。建设智慧教室,提供课堂应答终端、交互式电子白板、多屏互动系统等设备,改变传统的“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听”的单向教授模式。鼓励学生参与实时讨论,开发即时投票反馈工具,有效激发学生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主题讨论的积极性。同时,还可以运用学习管理系统实时采集分析学生的课前预习、课中参与以及课后作业情况,为每个学生建立“学习情况画像”,方便教师动态调整教学策略,及时推送差异化学习内容,真正实现因材施教。

打造数字文化体验空间

数字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教育,需要延伸教育场景,将其从书本、课堂拓展至学生学习生活的全时空场域。要利用数字技术打造处处可感知、时时可学习的校园文化生态,有效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完成认知内化和行为外化。其一,打造沉浸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空间和数字展厅。以图书馆、学生活动中心等公共教学空间为依托,运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全息投影等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区。比如,浙江音乐学院依托国家级智慧琴房标准化试点项目,将标准化理念、数字化平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通过统一数据接口、资源格式、服务流程和评价规范,建设数字化教学平台与虚拟仿真体验空间,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其二,策划数字技术赋能的文化主题系列活动。在二十四节气、重要历史纪念日等时间节点打造校园文化活动,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创新活动形式。以端午节为例,可以策划“线上+线下”有机融合的端午节庆活动,线下在校园内开展包粽子比赛,线上直播连线比赛现场,同时开展线上龙舟竞渡模拟游戏,引导学生充分体会传统节日氛围。还可开发“校园AR导览系统”,收集知名校史人物、经典建筑故事、景观文化内涵,打造AR导览系统,运用手机扫描二维码或图片,便可触发动画视频讲解或相关情景再现,让校园不只是实体空间,还是一座没有围墙的文化展厅。其三,培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学生社团。鼓励学生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立兴趣社团,涵盖文雅书卷类、传统技艺类、国风综合类、文史通史类等。同时,学校为社团提供专业培训指导,打造线上展示平台,鼓励社团创新应用播客、短视频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日常生活为核心开展创意生产,不断提升社团活动的专业水准。

搭建数智化协同育人平台

利用数字技术搭建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育人平台,有助于打破信息、资源壁垒,推动高校与地方政府、科研院所、文化企业互联互通,形成开放包容的文化育人新格局。一是高校积极与博物馆、图书馆、非遗保护中心等建立合作关系,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虚拟展览、数字讲座、公开数字藏品等资源引入校园平台。邀请考古学家、文博专家、古籍修复师等参与高校教学活动,向学生讲解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知识,普及数字化保护手段,推动行业前沿动态进入校园课堂,有效开拓学生知识视野,深化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为其传承创新奠定坚实基础。二是高校与数字文化企业积极合作,围绕智能教育产品设计、传统文化数字内容开发等开展产学研协作项目,邀请企业技术人员进入学校担任产业导师,为学生讲授理论知识,指导开展实践。鼓励学生进入企业开展实习实训,以企业真实项目深化学生对数字技术和文化传播融合逻辑的理解,不断提高学生的数字素养和文化传播能力。

(豆乃强单位:浙江音乐学院;刘梦伟单位:浙江艺术职业学院;裘丹娜单位:浙江省长三角公共服务标准化研究院。本文系浙江音乐学院国家级智慧琴房标准化终期项目成果)

红色文化高质量传承传播的路径研究

陈 婕

延安作为革命圣地,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厚重的历史记忆,蕴含着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延安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边区军民创造形成的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时代背景下,让延安红色文化持续焕发光彩、滋养人民精神世界,推动延安红色文化高质量传承传播成为重要课题。推动延安红色文化高质量传承传播,不只是回顾历史、纪念伟人,更要与时俱进,立足当代人的精神需求,融合现代审美趣味与传播方式,推动红色文化持续传承焕新,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史育人。

构建时代阐释话语,推动延安红色文化活态传承

系统梳理延安时期理论文献与政治实践,有助于还原有根有魂的延安红色文化演进图景,以可追溯、可对话的方式推动延安红色文化活态传承。应组织哲学、文学、党史等多学科学者组成专门团队,选取《实践论》《矛盾论》中与延安密切相关的篇目进行精细化梳理,并立足当代需求作出新的阐释,形成学术随笔、通俗读本、专题研究丛书等多元成果,满足不同读者需求。与此同时,还可以时间为线索打造延安时期理论成果可视化知识图谱,整合重大理论创新、重要政策与关键事件,清晰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脉络。开发移动端检索平台,方便公众自主查阅,减少知识碎片化,帮助公众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和认同延安红色文化。

再造智媒传播场景,拓展延安红色文化触达空间

进入21世纪,大数据、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先后涌现,深刻影响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渠道,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在此背景下,传统实物展陈、纪录片放映等展示模式逐渐落后,难以有效激发青年群体的兴趣。依托智能技术再造传播场景,能够让延安红色文化突破时空限制,以沉浸式体验提升公众对延安红色文化的情感认同,深刻激发情感共鸣。在数字化场景搭建层面,可以打造延安革命旧址“云端游览”模式。延安革命旧址数量众多,包括枣园、南泥湾、王家坪等,可以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革命旧址,运用高精度扫描技术,对场景进行数字化采集。同时,结合口述史、老照片、馆藏文献等资源开展校对、补充,在此基础上搭建“延安革命旧址三维数字化场景”模型,打造线上虚拟展厅,公众运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扫描二维码或佩戴智能头显设备,便可以“回到”革命年代,自由切换观赏视角,以直观感知深化对延安红色文化的了解。同时,需要兼顾海外受众特点,开发多个语言版本,扩大延安红色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在数字内容创作层面,可打造延安红色文化数字叙事产品。选择重大历史事件、经典革命故事,结合受众需求,推出红色剧本体验,打造轻量化微短剧,制作有声故事专辑,并在各大社交网络平台传播推广,拓展延安红色文化的辐射范围和传播力度。除此之外,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也为延安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了新路径。高校可以选取一些感人至深的延安革命故事、烈士红色家书等,运用大语言模型技术生成分层分段双语阅读素材、主题写作范本,在提高大学生语言学习能力的同时,助力大学生深刻感悟红色精神。

创新实践载体,深化校园育人与日常传承

推动延安红色文化高质量传承传播,不能仅依赖空洞、抽象的理论讲解,还需要以实践体验为“梯”,让延安红色文化走出展馆,进入课堂、融入生活。高校要在开设英语读写、跨文化交流等课程的基础上,推动延安红色资源分层分类融入其中。比如,在基础阶段,组织大学生围绕红色经典开展双语阅读,提高大学生运用外语讲述延安故事的能力和水平;在提升阶段,开展“延安红色文化主题双语写作与叙事活动”,组织大学生对比中西文化异同,深刻体悟延安精神;在拓展阶段,鼓励大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开展延安红色文化双语短视频创作及海外社交媒体传播实践,推动知行合一。同时,配套建设“延安红色文化双语教学案例库”,建立“课堂理论教学—实际训练创作—国际推广传播”的外语课程思政闭环,联动红色旧址馆校共建,聘请导师开发项目,打通课堂。除此之外,还需要在广阔田野中扎根探索。延安红色文化元素众多,可选择相关元素设计研学路线,配备辅导教师、研学教案和培训体系,改变传统的“景点打卡”模式,组织大学生撰写田野笔记、参加农事劳动,访谈老红军后代,收集相关口述史料并开展分组研讨。同时,也需要创新宣传教育形式。可以组织大学生开展红色沉浸式歌舞剧、延安红色文化主题演讲比赛等,并组织专业指导团队送课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鼓励高校成立红色文化宣讲社团,进入社区宣讲延安故事,奔赴乡村学校建立爱心图书角,搭建青年志愿服务网络,将文化传播与公益实践有机融合,把志愿服务纳入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让大学生在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中不断体悟延安精神,打造人人参与、生生不息的红色文化传承生态。

数字时代,通过表达逻辑的重构与传播范式的创新,延安红色文化的传播传承有了全新的路径。推动延安红色文化高质量传承传播,不能只是复述“过去发生过什么”,更需要秉持科学的方法论,让延安红色文化走出纪念馆展柜、走出泛黄纸页,成为流淌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精神血液,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陕西力量。

(作者单位:西安翻译学院)